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刘献君 主编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

刘久明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刘久明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年9月
ISBN 7-5609-2539-1

I. 郁…

II. 刘…

III. 郁达夫(1896~1945)-文学研究

IV. I206.6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

刘久明 著

责任编辑:徐汉明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陈时君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5012

经 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58 000

版次:2001年9月第1版

印次: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609-2539-1/I·90

定价:12.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领域里,他甚至可与鲁迅并列,并称“双峰对峙的两大家”。郁达夫的创作,深深得益于外国文学的滋养。十年留日生涯,使郁达夫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西方的英、法、德、俄等国文学,东方的日本文学,他都曾广泛涉猎,并从中汲取艺术的乳汁。对外国文学的多元接受,不仅滋养了郁达夫的文学性情,陶冶了他的人格气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

为了阐明郁达夫创作的复杂性,解开“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之谜,进而真实地还原郁达夫这位新文学开拓者的历史形象,本书作者将郁达夫置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大背景中,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他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作者通过重点探讨郁达夫与十余位外国作家(思想家)之间的事实联系以及他们在创作上存在的同源性关系,揭示了郁达夫创作中的外来影响及其所发生的变异。在强调外国文学对郁达夫创作影响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对郁达夫创作的制约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以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为主、辅之以平行研究的方法,同时还适当借鉴了接受美学的理论与方法。

总序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刘献君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创办文科已经 20 年了,回顾 20 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理工科大学可以办好文科。20 年来,我们从无到有,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教师,建立了多种学科、专业,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现在,已经拥有 2 个博士点,14 个硕士点,11 个本科专业,其中部分学科建设已经走在国内前列。我们培养了一批教授,其中有几位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在全国各地努力工作,不断受到好评。

二是在理工科大学办文科十分艰难,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难,主要难在要克服传统的习惯,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创建适合文科发展的氛围。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从上到下,对文科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因而不容易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套工作方式都是适合工科的,往往用对工科的要求来规范文科。可喜的是,经过 20 年艰苦努力,这些方面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面向未来,我们应对文科的发展充满信心。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一步规划文科的发展。要本着“均衡发展,重点突破”的方针,在现有格局的基础上,确定三至四个学科作为重点,集中

人力,财力,使这些学科获得优先发展。同时,其他学科也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科建设规划,努力办出特色。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引进、培养、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水平则是关键。办文科主要靠人,靠高水平的教师。要采取超常规措施,通过多种方式,把国内知名学者吸引到我校,从事教学和研究。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还要大力开展学术研究。首先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的加强,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组织起来,承担重大课题,从而通过我们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依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要端正学风,切忌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通过长期的努力,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文科建设,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开始,出版了“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多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得以问世。现在,由于院、系调整,文科院(系)目前包括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外语系、高教所等,因此学校决定出版“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这是加强整个文科建设的一个有力举措。

现在,丛书中的几本专著即将面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科学术专著源源不断地出版,并将有力地推动文科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9年5月31日

序

龙泉明

刘久明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嘱我作序。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我自然乐意。刘久明于四年前考上武汉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他于1990年南开大学外国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意识到改换专业攻博是有相当难度的,因而他除了在职承担教学和行政工作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专业的学习和钻研之中。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努力,他终于完成了学业,博士论文《郁达夫与外国文学》顺利通过,获得了博士学位。

郁达夫是五四新文学的卓有建树的开拓者之一,曾有人将他与鲁迅、郭沫若的地位并举,尽管这种评价不一定会被大家所接受,但郁达夫作为一位创作丰富多样、风格卓异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新时期之初,郁达夫研究曾成为热点,但“热”过之后,几归于沉寂。从总体上看,郁达夫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他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广泛和深入,至今未见到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郁达夫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著作。可以说,要真正对这位西化倾向甚为突出、精神世界十分丰富复杂的作家有着完整的理解和认识,不对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作出全面考察,是不可能的。出于这种考虑,刘久明的博士论文选择了“郁达夫与外国文学”这样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刘久明的博士论文将郁达夫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置于世界性文学交流与发展的背景和中国文学新旧嬗替的整体过程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对郁达夫与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奥文

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将郁达夫与对其影响较大的作家的关系进行具体透彻的分析,从而展现出郁达夫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清晰脉络和完整轮廓。其中对以前很少有人涉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缪塞、尼采、施蒂纳、施笃姆、弗洛伊德、谷崎润一郎、“黄面志”作家群与郁达夫关系的揭示,颇有独到的眼光和发现。作者在驳杂繁复、或隐或显的外部影响中,揭示郁达夫对外国文学的独特性选择及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其中对郁达夫对两类外国作家的偏爱的揭示,颇有真知灼见。他指出:“郁达夫偏爱的外国作家,大抵上有两类:一类是那些具有浓厚的浪漫气息、作品有着强烈的抒情因素而且艺术性较高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卢梭、施笃姆等;另一类则是那些身世坎坷、或者其经历和遭遇与郁达夫本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而且其作品突显出创作主体强烈的个性的作家,如英国的‘黄面志’作家群等。”这是作者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其论述极具说服力,让人切实感受到郁达夫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新文学作家,所受外国文学熏染与影响之深重。同时,作者对郁达夫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性以及对其创作风格与面貌的形成的影响的阐发,颇为中肯深刻。总的来说,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视野,深入发掘,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新见多且不失稳妥,资料丰富翔实,阐述理据充分,论说纵横开阔,评述相当深入,尽管有些地方论述还不够深入、分析还欠充分,但论文总体上显得扎实厚重,颇具学术的份量与价值。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属于比较文学范围。中外文学比较在“影响研究”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一领域,是大有作为的。应当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理清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本国作家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根本区

别,即是它与外国文学和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主要成因之一。要真正发掘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动因及其思想资源,揭示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必须全面深入地开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尽管已做了不少工作,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做好这种“影响研究”工作,难度是相当大的,它对研究者素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作为这样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他首先应当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其次,他也应该是一个相对称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立足于这样的学术基础之上,他才可能真正创造出他的学术天地来。刘久明正因为过去是外国文学科班出身,又经过几年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深造,而具备了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所以能够比较出色地完成这个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作为老师与朋友,我为他取得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高兴!听说他马上要去日本访学(半年),然后去南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作博士后研究工作,我预祝他在学术事业上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2001年7月于武大寓所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郁达夫与俄国文学	(14)
第一节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	(16)
第二节 郁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34)
第二章 郁达夫与法国文学	(50)
第一节 郁达夫与卢梭	(53)
第二节 郁达夫与缪塞	(68)
第三章 郁达夫与英国文学	(81)
第一节 郁达夫与英国感伤主义文学	(85)
第二节 郁达夫与“黄面志”作家群	(97)
第三节 郁达夫与王尔德	(108)
第四节 郁达夫与劳伦斯	(120)
第四章 郁达夫与德奥文学	(132)
第一节 郁达夫与尼采、施蒂纳	(138)
第二节 郁达夫与施笃姆	(152)
第三节 郁达夫与弗洛伊德	(164)
第五章 郁达夫与日本文学	(183)
第一节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187)
第二节 郁达夫与谷崎润一郎	(201)
结 语	(213)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25)

绪 论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有着相当特殊地位的作家。他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却自成一体,甚至自成一派。不少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的陈西滢、30年代的黎锦明,到70年代的司马长风)在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成就时,都首推鲁迅和郁达夫为“双峰对峙的两大家”。无独有偶,20世纪50年代日本大学开设中国文学课程,现代作家中也只选了鲁迅和郁达夫。对于郁达夫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刘纳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她说:“新文学开拓时期最具叛逆性的声音是发自三个截然不同的个性:理性最为强健的鲁迅、情感最为强烈的郭沫若和神经最为纤弱的郁达夫。”“郁达夫与鲁迅、郭沫若及其他作家一起,共同奠定了我国文学‘新’的格局,支撑起崭新的文学世界。”^①许多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学者,也都视郁达夫为新文学运动中一位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作家。美国学者李欧梵指出:“郁达夫的一生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因为他走过了五四文学时

^① 刘纳:《郁达夫——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光明日报》1985年9月5日。

期的整个历史道路,也走遍了五四文学运动所波及的每个地方。”^① 加拿大学者米切尔·伊根认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郁达夫既是一个主要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又是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作家的典型。他既是一个伟大社会时期的小说的先锋作家,又是个具有无可匹敌的独创能力的文体家,在散文体方面和主题的选择和组织方面的革新者。”^② 捷克著名汉学家安娜·多勒扎洛娃也认为:“郁达夫的创作活动,是中国文艺创作史上孕育着各种思想的复杂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郁达夫不仅是创造社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在实际活动中最活跃和最出色的人物。”^③

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虽然已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与肯定,但是,从整体上看,作为新文学早期开拓者之一的郁达夫还远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无论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或是其创作的价值,都还不能说已被人们充分认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郁达夫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尽管郁达夫被人视为可与鲁迅并列的“双峰对峙的两大家”之一,然而学界对于郁达夫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很难与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称。安娜·多勒扎洛娃博士曾经指出:“尽管郁达夫的文艺作品,是中国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现代文学中最富有个人特色的完美杰作,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或在世界上,他的作品却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或深入研究的课题。”^④ 时至今

① [美]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一代》,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5年版,第528页。

② [加]米切尔·伊根:《郁达夫: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过渡》,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③ ④ [捷克]安娜·多勒扎洛娃:《郁达夫研究》(黄川、黄向晖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日,安娜博士所指出的这一问题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如何将郁达夫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至今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学界努力的课题。

二

在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中,郁达夫在学识、修养等方面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代。他们成长于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因此他们也有幸被时代造就成为思想与文化的“巨人”。这一代作家有着后来者所难以比拟的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知识蕴蓄,有着渊博的学力与识力、深刻的历史感、敏锐细腻的审美能力以及个性的生动性、内心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深度。置身于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现代与传统错综重迭的特定文化语境中,这一代作家的审美态度、人生态度、文学观念以至思维方式都表现出后来者所难以企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显然,在单一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传统的维度中,是无法解释这一代人何以有着如此惊人的思想与人性的深度,何以有着如此复杂的精神世界与创作个性的。惟有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些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中国历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少有的文化多元化与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五四时期,门户初启,各种外来的文化与文学思潮有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并与古老的中国文化发生猛烈撞击。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狂欢时代。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们,就是在这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开始他们的创作准备并且步入文坛的。正因为如此,以五四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成为了与我国传统文学呈现出极大差异的一个崭新的文学实体。捷克学者普实

克曾经谈到他个人的如下经验:当他“初次接触中国新文学”时,他因这种文学与中国旧文学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差异”而震惊了。毫无疑问,这种“巨大差异”的产生,正是五四新文学在中外文化接触、撞击中,汲取和借鉴外国文学创作经验的结果。普实克也正是在认识到了产生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之后,才把“中国的文学革命”归结为“两个不同文化的世界之间发生的伟大的、历史性的碰撞”^①。

鲁迅曾说过,新文学的诞生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学的影响。鲁迅甚至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② 胡风则认为:“从五四以来,大有成就以至稍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③ 的确,以郁达夫等人代表的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差不多都是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成长的。五四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使这一代人有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外来文化的熏染。他们中间许多人或留学欧美,或留学东洋,因而他们能以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多元化地接受东西方文化。对东西方文化的多元接受,恰恰构成了这一代作家文化品格的一种特质。五四时期,当这一代经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新式知识分子接受历史的重托,承担起创建中国新文化和开拓新文学的重任时,早已被这一代知识分子接受并且已化作了他们的血肉的外来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的文学观念乃至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换句话说,以外来文化和文学为参照系来构建新文化与新

① [捷克]普实克:《抒情诗与史诗》,《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第9期。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见:《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③ 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

文学,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就成为一种必然。

以外来文化和文学为参照系所建构的新文学,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正因为如此,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学,就必须以外国文化和文学为参照系,否则,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品格。对此,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的。他们中间的一些有识之士曾一再指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不从中外文学关系入手,往往是极其片面和肤浅的,许多文学现象,更无从理解。”^①“惟有以 20 世纪的世界性文学交流为背景,才可能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们的历史形象,才可能追溯到他们的思想、情感信念、胆略和理想的源泉。”^② 这些观点,不仅是学者们的经验之谈,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三

郁达夫在他的《小说论》中曾经指出:“五四文学实际上是西洋文学在中国的一个分支。”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其中无疑又包含了郁达夫自己的切身体会。毋庸置疑的是,在郁达夫自身的创作中,就显示了东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加拿大学者米切尔·伊根认为,“郁达夫通常被认为是个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原型的现代型作家”^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

① 贾植芳:《屠格涅夫与中国·序》,见孙乃修著《屠格涅夫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曾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导言·论世界文学时代,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③ [加]米切尔·伊根:《郁达夫: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过渡》,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上,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代名家,郁达夫确实深深得益于外国文学对他的滋养。

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郁达夫与外国文学关系之密切,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熟知郁达夫的郭沫若曾经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我们感觉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① 郑伯奇后来也回忆说:“达夫的外国文学知识也是相当渊博的。……读了不少外国文学的书籍。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专读一个作家,也不专攻一国文学,凡是名著杰作,他大都阅读。甚至初露头角的作家,或者不大出名的作家,只要兴趣相投,他也津津乐道。”^② 大量、广泛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无疑为郁达夫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各国文学的窗户,同时使他有可能吸纳不同种属文化的因子,并且将其化作自己的血肉,来滋养自己的气质、性情和艺术的禀赋。

郁达夫接受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留日时期。从1913年到1921年,郁达夫在日本度过了将近10年的求学生涯。这10年,是郁达夫告别少年时代、步入青年时代的人生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重要的创作准备和积累时期。10年留学生涯,对于郁达夫既是一个获取文化知识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在高层次的文化环境中二度形成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教养、人格气质、价值观念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是其文化心理结构经历裂变与重铸的过程。

留日10年,表面来看,郁达夫接受的是日本的文化教育,但实际上,他在“东洋”读的都是“西洋的书”。自“明治”中后期至大正

① 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第3期。

② 郑伯奇:《忆创造社》,原载《文艺报》1959年第8期。

初期,日本的教育和军事、医学、哲学等门类一样,主要是“仿照德制”^①。郁达夫就读的东京帝大,推行的就是“德式”教育,所要求的第一外语也是德语。郁达夫等人所学的专业,又是最重德语的专业。据郭沫若回忆,他们专业“所用的参考书多是德文书”,“一个礼拜的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点以上”^②。而“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生的文学士……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做课本”^③。对于郭沫若来说,“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求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④。同样,这些功课也进一步助长了郁达夫对于文学的兴趣。他的爱读外国小说的癖好,正是在这一时期养成的。郁达夫自己后来回忆说:“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就是现在,于吃饭做事之外,坐下来读的,也以小说为最多。这是我和西洋文学发生关系以来的大概情形。”^⑤郁达夫的好友钟敬文也说过:“达夫先生在帝大是学经济的。……他的阅读兴味主要是在小说上。仿吾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他在帝大读过三千本以上的小说。当时我听了虽然很感佩,却多少不免有些怀疑。后来在东京也间接听朋友转述了帝大一位图书馆员所说的话。他说,达夫先生在那里借阅的小说的数量,后来很少人能够追赶上去。”^⑥郁达夫对于文学的兴

① 参见[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页。

② ③ ④ 《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43、58页。

⑤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见:《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

⑥ 钟敬文:《忆达夫先生》,见:《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培养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外国文学开启了郁达夫迈向文学殿堂的大门。郁达夫在日本最初学医,后改为学经济,而最后他又转向了文学,这显然是与这一时期他所阅读的大量的西洋小说对于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读书期间,郁达夫生活的“大高”文化社区是一个已经“西化”了的日本文化社区。这一文化社区作为文化传播中的环境媒介,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也制约、引导着郁达夫对西方文化的接受。

郁达夫留学日本之时,正值日本的“大正”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文化活动中……文学和哲学领域内的动向都同时显示了新时代的开始”^①。大正年间开放自由的时代气氛,使郁达夫有机会同时接触到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郁达夫后来回忆说:“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时代,正当明治维新大业完成之后,百务向上,达到了敌国在数百年间仅有的社会兴盛期的顶点。那时候……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19世纪文化的结晶,自然主义中的最坚实的作品,车载斗量地在那里被介绍。”^②这一时期,郁达夫所面对的是异常芜杂的、令人无所适从的西方思想和文化现象。他说:“两性解放的新时代,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妹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

① 周佳荣:《近代日本文化与思想》,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5年版,第100页。

② 郁达夫:《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星洲日报半月刊》1939年5月15日第22期。